

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

——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分析

卢 汉 龙

在加强社会的监察和评价系统的工作中，我国自1983年以来已开展了关于社会指标的研究，并从1984年起由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中国社会统计资料的主要数据，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指示器研究提供了丰富和可靠的基础材料。但是依然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如何来评价这些指标，这些指标中哪些是对社会评价有实际意义的；群众的生活在这些指标指示的范围里实际情形如何；他们的感受如何；哪些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力又有哪些，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必须注意直接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深入了解群众对生活好坏的质量评估，这是一般的经济指标、宏观社会指标所难以穷尽的，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的研究领域。

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分析模式大体上确定了生活质量分析的范围和如下三方面有关：一是和个体直接的生活内容有关，二是和个体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三是和个体对生活的评价有关。我们的分析也就围绕着这三个方面进行。由于生活质量分析是和社会环境以及个体评价有关的，所以我们的报告也就同时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有关个体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体生活评价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读者可以参阅林南和卢汉龙根据本次调查所作的《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结构模型探讨》一文中的论述。这里我们根据该文所列的概念类型，着重分析社会资源与生活质量评价9个方面的社会情况，并根据理论上对这9个方面的期许来进行报告。在这9个方面中，前面6个方面是有关个体生活社会资源条件的情况，后面3个方面是有关个体生活评价方面的内容。它们是：

1. 社会关系网——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善吗？
2. 地位——社会个体的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公平吗？
3. 工作——职业酬报中追求的是什么？
4. 财产与消费——人民的生活“小康”了吗？
5. 居住环境——居民们越来越关心的是什么？
6. 业余生活——市民生活丰富多彩吗？
7. 生活满意度——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
8. 精神健康状况——市民的生活幸福感。
9. 反馈性行为——成员社会积极性如何？

下面我们便分节加以报告。

* 这是一份关于上海市民生活调查的分析报告，重点分析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问题。该研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生活研究室承担的上海市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与时间分配”的研究报告之一。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社会调查处参加了课题的调查与研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林南教授在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和合作，特此致以谢忱。

社会关系网——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善吗？

个人的社会网联系是社会关系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它以个体的家庭联系为核心向外扩展，并根据不同角色的人际关系，建立起个人与他人及与社会的种种联系。这些联系结成一个网络，成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支持系统。这个支持系统的构成与质量是市民生活质量中一个重要的资源条件。

(一) 调查证明，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特别关心和注意人际社会关系的好坏。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被调查者在近一年内本人或家庭成员中所发生过的生活事件。结果发现，被询及的1 200名对象共填答了发生过主要生活事件有4 068起，指出最大坏事者有625人。我们将这些被市民认为是生活中最大坏事的前12项列出如下(表1)：

表1 市民认为最大生活事件的统计

生 活 事 件	应答为最大事件的人数		占应答人数的百分比	
1. 亲戚朋友患重病	69		11.04	
2. 家庭成员患重病	64		10.24	
3. 亲戚朋友死亡	59		9.44	
4. 被人误会错怪	46		7.36	
5. 失窃		43		6.88
6. 家庭成员死亡	35		5.60	
7. 工作学习负担过重		34		5.44
8. 婆媳关系紧张	32		5.12	
9. 因生活琐事与人争吵	32		5.12	
10. 工作学习遇困难挫折		32		5.12
11. 家庭经济困难		28		4.48
12. 与上级领导不和	21		3.36	
小 计	358	137	57.28	21.92
应 答 总 人 数	625		100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12件主要被认为是不幸的事件中，跟人际关系的结构组成或质量好坏有关系的占了8个项目，是全部应答个案的57.28%。^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市民感到生活中最不幸的事情是人际关系发生了问题。

(二) 在市民的各项人际关系中，他们对夫妇关系的评价最高，对与领导关系的评价最低。

我们分别询问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工作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满意程度，用五级评分得出有关结果：市民对各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均在一般偏好以上(3.5分以上)，其中尤以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为最高。在对家庭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方面，配偶关系和血缘联系是极重要的，基本上是共居的家族联系，满意度均高些，而跟不共居的亲戚关系(包括直系血亲的)其满意度便低于和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

在和工作单位的人员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和同事的关系与和领导的关系在满意度上有着较大的差别。其它有关人际交往事实的资料也很能说明这种差异。比如在目前仍在任职的961位市民中，自诉最近一年里发生过和上级关系不和的人有71位(占7.4%)，而跟同事关系不和的有39位(占4.1%)。也就是说，如果在100人左右的工作单位里，大约会有7个职工和某

^① 在这44项生活事件中，有关人际关系的项目占14项，其中5项是各类有关人员的生病或死亡。

些领导人之间产生不和，而只有4个人会和同级同事之间有矛盾。^①由于领导只是单位里的个别人，它和群众的互动联系总数大大小于群众之间的互动总数（按排列组合原理）。因此，干群之间产生矛盾的机率就更为大些，对个体造成不幸感的可能性也越大些，群众对干群关系满意度处于各人际关系满意度的最低是个值得重视的事实。

（三）市民在生活中遇到不幸时，他们从哪里获得帮助。

据统计，在625位认为在一年里遇到过最大不幸事件的被调查者中，有134位人报告说当他们遇到这些不幸事件时，曾得到过别人的帮助。此数约占总数的1/5。于是我们便继续询问他们从哪些人方面获得帮助，得到过哪些帮助。

调查表明，来自家族的帮助居于社会网关系中的首位，约占全部受帮助关系中的37%。而且在家族网的帮助中，长辈对小辈的帮助是小辈对长辈帮助的二倍（各占16%和8%）。其次，略逊于来自家族的帮助，但也拥有相当比例的帮助是来自工作单位里的社会网关系，它占全部帮助关系总数的34%，其中来自单位领导的帮助略低于来自单位同事的帮助（分别为16%和18%），但领导的帮助也和家族中长辈帮助的比例相同。^②而且，来自单位同事的帮助比例是所有我们划分的9类关系中（夫妇关系、和子女关系、和家庭其他成员关系、和同事的关系、和亲戚的关系、和邻里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的首位。另外，市民接受来自家族和工作单位以外的人际帮助占全部帮助关系的29%。在这些帮助中，以邻居帮助为最多（占总数的12%），其次是得自朋友的帮助（占10%）。同时调查结果表明，有2%的市民得到了素不相识的市民所给予的帮助。

这些帮助者给予受者的帮助性质以精神鼓励的为最多，占67.9%，帮助办些事的占48.5%，给予经济和物质方面帮助的仅占19.4%，当然也有同时给予多种帮助的。如果我们结合对照前面表1.1所列的主要生活事件的内容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精神鼓励居于多数。因为大多数被市民认为是最大的不幸事件都是受到了以人际关系失调为主的精神打击，因此市民在感到不幸时需要得到精神方面的鼓励就是极自然的事了。

综观上海市民社会网关系及其支持系统的结构和质量我们可以认为，上海市民的生活联系主要仍以传统的血缘、业缘和地缘为主，而且集中于面对面的直接联系。关系越简单，越直接，感觉上的满意度也越高。组成关系越复杂，人际关系的感受便越差（如涉及到科层关系的干群联系满意度便差）。越出亲朋、工作单位同事和邻居外，上海市民的社会关系便很少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在市民社会里缺乏多元性的以角色特征相分离的联系，如以法律、政治、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经济等角色特征专门化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市民对多元化社会联系的适应性也有一定的问题。家庭和工作单位的人际联系，是上海市民社会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可靠的渠道，这是由上述社会网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如何来保护家庭和工作联系这些渠道的畅通，又要承认随着市民社会网关系结构的变化，这些渠道的狭隘性与封闭性将会使人们生活中支持系统的完善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地位——社会个体的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公平吗？

地位是社会结构特征在个人身上的投影，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资源条件。个体各

① 这里所指的不和是只统计那些被认为是坏事的不和。因此，应当看到“和领导的不和”比“和同事的不和”更容易被作为不幸事件来报告。

② 这9类人际关系分别为：长辈、平辈、小辈、单位领导、单位同事、同乡、邻居、朋友、素不相识者。

类地位特征的合理性是指示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主要是资源分配）的有效指标。这里，我们主要是从年龄、性别、父母职业等先赋的一些社会地位特征和个人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等通过自致努力得到的地位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观察上海目前在市民地位构成方面的合理性和社会公平的现象。

（一）市民代际职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同代内的职业地位流动却很小。

我们首先来观察两代人之间和本人自参加工作至今的职业地位变化的情况。接受调查的1162名成年人是有职业的（含退休），其中971名目前仍是在职人员（包括退休回用者），职工的平均工作年份为26年（ $S.D = 20.1$ ）。

首先，上海市民的初始就业和父亲的职业关系不大〔相关系数仅为 $0.1649 (a_{15})$ 〕。而且，虽然调查也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有5%的职工在刚参加工作时，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是在同一个单位里，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文革”后的顶替就业（占此类情况的半数以上），因此如果排除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上海居民的就业基本上是和上代无关的。资料表明，70%以上的职工都是由国家分配参加工作的，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子承父业的先赋职业现象。

其次，被调查者的第一职业和目前的职业之间的相关系数达 $0.5937 (a_{12})$ ，表明职业的前后相关度较高即变动较小，而且从本人参加工作开始到目前这段时间里，他父亲的工作变动度更小（即中年至老年），其相关程度可达 $0.8432 (a_{66})$ ，也就是说，一个人当子女参加工作之后，他的职业变动就基本上停止了。从职工参加工作后调动工作单位次数来看也很能说明这种情况。在平均工龄为26年的职工样本中，每人平均调动工作单位仅1.2次（ $S.D = 1.7$ ），许多人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另据推算，在二十余年的工作经历里，体力劳动的工人（包括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向其它性质劳动职业的流动率约10.5%。可见在几十年里职业结构的变动本身就是不大的。

同时我们又可注意到，在职业变动不大的幅度里，婚姻对职业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第一职业和配偶第一职业的相关度仅为 $0.2910 (a_{13})$ 。由于婚姻一般是发生于第一次就业后不长的时间里，择偶时夫妇双方的职业地位虽然有一定的相关度，但并不很大。可是本人目前的职业和配偶目前的职业的相关度上升到 $0.3658 (a_{24})$ ，有了明显的接近趋势。婚前夫妇的职业距离越大，婚后相互流动靠拢的趋势也越烈，说明婚姻地位与职业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意义的相关性。

（二）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和年龄、性别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国际上一般以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这3项指标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下面我们继续来分析上海市民的这些指标年龄和性别非个人力量或努力所能决定的人口特征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的年龄和性别跟各项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皆有一定的相关性，并具有如下几种不公平的现象。

第一，相关系数表明，**年龄越大受教育的程度越低，但是职业地位却反而越高，收入也越多**。深入的分析又发现，如果将总收入分为基本工资收入、奖金收入和其它收入三部分的话，年龄和基本工资收入的相关度更高，可达 0.3755 ，超过了年龄和教育的相关度更多，而奖金和其它的收入则和年龄呈负相关（各为 -0.3375 和 -0.0804 ），从而减少了总收入和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可见后者对平抑收入中的年龄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性别和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收入的水平都呈负相关，说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平均状况都低于男性。分组资料表明，女性的文盲率是男性的五倍，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仅为男性的一半左右。如果将职工工资分为高、中、低的话，^①我们发现，男女工资在中档水平的比例还比较接近，而在高档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女性59.6%的人皆在低工资的行列中，而男性于此比例数为35.8%。同时，女性只有15.6%的比例是属于工资100元以上的，而男性却有37.8%的比例，比女性高出一倍以上。值得进一步思索的是，职业地位和性别的相关性并不高，就是说在职业方面男女的差别并不是很显著的，那么是否有理由认为，在职业分布上，一方面存在着分配不当的问题（比如职务和受教育程度水平不够吻合），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三）在自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各要素内部，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的相关性有着明显的改善，但它们和收入的相关性并不很大。

为进一步考察社会的公平现象，深入研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三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内容。

上海市民文化程度与职业地位的相关度已达0.6以上。这是近年来在用人制度的改革上注重知识化所取得成绩的一种表现。但职业地位与收入的相关度，以及文化程度与收入的相关度，均处于相对低的状况之中。进一步分析又发现，市民中职业（以及跟它有较大相关性的文化程度）与收入的差异不合理之处主要不是表现于基本工资，而是表现于奖金和其它收入方面。如果光从基本工资来看，需要高知识的职业工资水准皆明显高于只需要低知识的职业工资。但是奖金和其他收入方面却处于较低的水准，而目前奖金和其他收入已占市民总收入的1/3以上，因此奖金和其它收入在降低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与收入之间相关性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市民文化水准和职业、劳动力结构的状况来看，继续提高职业地位、文化程度和收入这三者之间的相关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目前市区成年人的文化程度和接受专业训练程度并不高，具有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和大学教育程度的人数仅为成年人总数的7%和14%左右。而从目前上海的产业结构和面对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来看，职业对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只有当全民的文化水准都有相当的提高时（比如大学普及率达到很高时），只有就业不只是以求得物质报酬为主，且更多地具有对精神报酬和其创造性意义的追求时，这种势头才会逐步消退下来，^②目前上海市民的职业地位与教育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和0.29，跟美国邓肯1961年所测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0.82和0.65相去甚远，跟1977年屈曼(Treiman)所作的包括美国和台湾在内五国家和地区职业比较的0.52和0.36相比，^③职业与教育的相关度虽高了些，但与收入的相关度仍有一定的距离，而屈曼研究中职业和教育水平0.52的相关度可以解释为是由于在发达社会的高教育水平下，教育的零相关效应已起了作用的结果。我们如参照邓肯1961年的相关系数值，象上海这样处于全国工业化领先地位的城市，职业、教育与收入的相关势头应继续发展下去更是毫无异议的。

① 按1987年的工资水平，我们将月工资在100元以上、80—99元、79元以下分别列高、中、低三档工资水平。

②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里，由于普遍受教育水准的提高，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减弱，产生了所谓教育与地位的“零相关现象”。

③ 参见Duncan, O.D.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1961)和Treiman, D.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77)。转引自林南、谢文“中国城市里的职业声望”。

工作——职业酬报中追求的是什么？

工作是市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在被调查的1 200位市民中,971名为在职职工,占成年人的比例为80%强。因此职业活动的质量对大多数市民的生活来讲影响重大。

调查发现,在这九百余名职工中,有284位职工(占29.2%)表示希望调出目前的工作单位,而明确表示不愿离开本单位工作的人仅1/4。同时又发现,被调查者中希望在本单位里调换工作班组或车间办公室部门的人员有182人(占18.9%),还有大约半数左右的人对是否想调动工作的问题未加表态,说明有可能正在观望。这些令人注目的数字至少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职工队伍中对本职工作有较大的不安心倾向。那末究竟是哪些方面使他们对工作不满意呢?市民们对职业活动的追求倒底是些什么呢?

表2 市民对职业满意度的统计

职 业 要 素	满意度平均得分	标 准 差	个 案 数
对目前工作的总感觉	3.2869	.8627	971
和同事相处的关系	3.8206	.6745	970
对社会的贡献	3.5417	.7156	971
和领导相处的关系	3.5273	.7265	971
劳动形式和强度	3.3182	.8450	971
工作地点的远近	3.2621	1.1604	969
工作的技术复杂性	3.2433	.6557	970
职业的社会声望	3.1998	.8647	971
工作环境和条件	3.1917	.9575	970
工作的职权	3.1596	.7324	971
工作单位的福利	2.8412	.8958	970
工作收入	2.7753	.9227	970
晋级和提升机会	2.6839	.8954	968

注:满意程度分值按五级评分计量,1为最不满意,5为最满意。

(一)在对工作的满意度方面,职工对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和劳动强度最表满意,而对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提升晋级的机会最表不满意。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职工在职业活动中缺少什么。表2列出按五级评分得出的职工对工作各方面满意程度的得分。表中显示职工对工作总感觉的平均得分为3.2869分,处于一般偏上的水平。以此为分界线,职工对“劳动形式和强度”等前4项得分高些。从对工作地点的远近开始便产生较大的不满意感,最后的3项得分都低于3以下。可见职工对职业最感满意的内容主要是面对面的一些人际关系,而对工作中个人所能得到的经济酬报和发展的前景并不感到满意,因此酬报问题是职业活动中的主要缺口。

(二)在决定职业满意不满意的诸因素中,市民主要考虑的是物质酬报,最不在乎的是工作中的创造性意义。^①

^② 本文所指的劳动创造性意义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对个体发展意义上的创造性。

我们曾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职业活动各方面的35个指标进行因素分析,发现对工作的满意度的各项指标可成为一个聚合性较高的因素,上述12项满意感指标对总的工作满意度起着不同的作用。表2列出各指标按总满意度为1修正后的因子承担系数。

这张工作满意度各因子承担系数的排列次序表可以理解为各职业因子对职工工作满意度的贡献值。承担系数越接近于1,说明该项因子对工作满意的贡献越大。因此下表显示了促使市民对工作满意与否的主要条件是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投入和经济收入(即可理解为劳动对个人的物质产出)的满意程度如何(见载荷次序为1—3的3项)。概括地讲职工“乐业”的主要因素在于对物质酬报的追求。同时能说明这种倾向的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贡献值处于0.5000以下的4项基本上是和劳动的创造性意义有关的一些内容(见载荷次序为9—12),严格地讲,这些承担系数表明这些职业要素对工作的满意度已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属于职业活动中的另一类因素类别。处于中间的那些职业要素(第4至8项)大体上包括与权力和精神酬报方面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是实现更多物质报酬的媒介;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是一种目的,是对于从事创造性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满足。但从目前这张因素载荷的分布次序表来看,它更能使人们相信,权力与精神报酬对于上海市民来讲其意义是偏向于为追求物质酬报服务的。

表3 职业要素对满意度的因子承担系数

职业因子	因子承担系数	载荷次序	指标性质
对工作的总感觉	1.0000		
工作环境和条件	.9631	1	劳力投入与物质酬报
工作收入	.8611	2	
劳动形式和强度	.8501	3	
职业的社会声望	.8338	4	和精神酬报有关
和领导相处的关系	.8264	5	
工作的职权	.8189	6	
工作单位的福利	.7938	7	
工作中晋级提升的机会	.7861	8	
和同事相处的关系	.4844	9	
工作的技术复杂性	.4390	10	劳动创造性意义
工作的社会贡献	.1943	11	
工作地点的远近	.1831	12	

因此可以认为,就上海市民目前对自己职业的评价来讲,在职业追求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功利性倾向,重物质,轻精神,要求少付出多收益,这种对待职业的心态对于职工队伍中的不安心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

(三) 市民公认理想的职业是物质和精神酬报并重,但又觉得权力是最不值得考虑的。

如果说上述关于职工职业追求中的各因子分析是从职工目前对自己职业的满意度出发来分析的,因此带有一定的情绪偏向的话,那么从职工对其子女职业选择时所希望考虑的各因素结构,就可以看到市民在比较冷静思考时,对选择职业的理想要求是什么。

在被调查者中有318名对象家中目前有学龄期的子女。我们询问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在

就业时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因素，结果得出了下面的这张排序表（见表4）。

表4 市民希望子女在择业时考虑的因素

序号	职业因素	平均排序	标准差	个案数
1	工作的环境条件	3.2579	1.8890	318
2	工资收入	3.4413	1.7970	315
3	社会贡献	4.4698	2.4910	315
4	职业的社会声望	4.8540	2.6050	315
5	福利待遇	5.1524	2.5470	315
6	劳动的形式和强度	5.8952	2.9540	315
7	离家远近	6.1013	3.0220	316
8	技术复杂性	6.6068	3.2030	315
9	晋级提升机会	7.9206	3.6850	315
10	对子女的照顾	9.0382	4.1070	314
11	能掌握的权力大小	9.0506	4.2040	316

注：要求被调查者对上列11项职业因素按考虑重要性次序从1—11排列后统计，序号越大，重要性越低。

表中可见，排在前面的几项中，除了保持着工作条件、收入等物质酬报项目外，对职业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贡献的考虑都和前表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优先考虑的类目序表现出市民对理想职业追求还是同时考虑着物质与精神的酬报相结合的。处于中间的4项指标（第5—8项）基本上都是和劳动的创造性意义有关的，或者说是和个人的自我发展有关的内容。比如象劳动的形式和强度，体现了体力和脑力等不同的劳动性质，技术复杂性体现着劳动的创造性能力，离家的远近可体现为有无更多的自我选择的闲暇时间等等。这种先考虑报酬后考虑劳动的创造性意义，在考虑报酬时，对物质报酬和精神报酬并重的择业期望应当说是比较正常的，也符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下职业结构的一些特征。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和权力有关的职业要素被集中地排列在最后，这一方面说明对于工作中权力的社会价值和创造性意义并未被市民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以权谋私利的现象的鄙视。对照前后两表的结果可以看到，市民在职业追求方面理智与感情处于矛盾之中，理想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如何发扬对理想职业的合理追求，尤其是保护权力的精神酬报价值，充分体现其创造性的意义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财产与消费——人民的生活“小康”了吗？

自1979年以来，上海的消费基金增长极快，平均每年增加13.7%，大大超过了同期内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7.1%的速度。从经济角度看，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减少了积累和再生产资金的投入，并使社会购买力与可供商品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是件令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的决策者感到忧虑的事。从社会角度看，消费基金的迅速增长，重新调整了国民收入中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分配比例，一定程度上的泽富于民，使得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较快地提高，并且可以造成刺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进一步增长的社会动力，因而也是件好事。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市民在财产和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具体衡量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状况和消费增长的社会后果。

观察上海市民的财产和经济状况，首先是衡量市民的收入状况。根据上海市城乡抽样调查队对居民的家计调查结果表明，从1983—1986年三年间就业者的收入增长幅度是每年平均

增长17.7%。同期内由于家庭平均人数的减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的幅度更为大些,每年都在20%以上。^①但由于分配和物价等因素,到1986年仍有15%的家庭实际收入的水平下降了。从1984年到1987年这三年里,反映居民户收入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从0.2653上升到了0.4284,^②而国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也均在0.2—0.6之间。据估算,在1987年初,上海10%最高收入户这一头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另一头10%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的2.4倍。因此,这些年来由于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一方面群众在收入方面确实得到了实惠,另一方面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拉开的现象也正在逐步形成。从我们本次的调查资料来看,上海市民对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一般都较高,但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就较差,前者反映了居民家庭的经济生活确有好转,后者则同时反映了长期来过惯平均主义分配社会财富的上海市民对个人之间收入不均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市民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状况,可以从市民家庭中主要生活耐用品的拥有量指标中窥见一斑。从拥有量上看,市民在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拥有程度已达到了日本在7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且从消费意愿上看,“有机会就买”的户也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都说明近年来市民的家庭财产和生活方式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如果将拥有量和“五年内不买”这两项指标相对照,大约仍有10%左右的居民户虽然目前未拥有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品,可是目前也无购置打算,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经济问题。

下面再来分析居民的消费结构状况。接受调查的1200位居民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在调查时前3个月平均每月的各类开支情况,^③结果得出大致的分配结构表。(见表5)

表5中反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上海居民平均用于吃的费用占总收入的50%以上。如果按实际支出计算的话,居民们每花去1元钱,几乎就有6角以上是用在吃的方面的,尤其是副食品的支出更为惊人,几乎占了居民每月总支出的45%。因此,如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市民的生活仅处于刚摆脱贫穷的温饱之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居民在住房方面支出的费用实在过低。被调查者中有179名居住私房的居民近几年来连地租税、房产税都不需支付,实际用房支出为0。居住公房的户,其租金支出也仅占总收入的1.5%。此外,居民用于文化和娱乐的消费水平也极低,总共仅占收入的3%左右。这些消费因素都会相对使吃的比重有所升高。

另外,在这张消费结构表中我们还可注意两笔比重相对说来是较为可观的支出,一笔是请客送礼的费用,被调查者中六分之五皆有送礼的开支,且月平均数在20元以上,占收入的5%强。另一笔是养老或资助子女的费用,被调查者中三分之一多的人每月平均担负老人经济15元多,并有六分之一的人每月平均资助子女20元以上,养老和助幼的开支均占总收入的5%上下。这两笔开支说明上海市民的社会关系中均有一定的经济往来成份。这或许是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一些社会的特点之一。

据统计,表5所列的各项开支共占居民总收入的80%左右,余下的20%左右的差额主要即为居民手持现金或储蓄等形式存在的那部分收入,其消费倾向主要是集中购买耐用生活用品。据城乡调查队对市民收入弹性和支出弹性的分析指出,随着收入和支出的增加,市民购

① 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资料》1987年,第85期。

② 上海城乡抽样调查队供稿,《上海统计资料》1988年,第6期。

③ 由于接受调查的前3个月正逢春节期间,所以在请客送礼等有些指标方面偏大些。

表5

上海市民家庭生活费支出表

	平均金额	占收入百分比	个案数
每户总收入	360.59	100	1200
支出：主食	17.32	4.8	1200
副食品	13.65	36.51	1200
烟酒杂费	34.33	9.52	1200
房租*	5.37	1.5	1021
水费	2.03	.56	1200
电费	6.44	1.79	1200
书报费	5.53	1.53	1200
服装	26.23	7.27	1072
本人学习费	2.63	.73	442
子女学杂费*	5.39	1.5	543
请客送礼费*	22.65	6.3	1007
娱乐费	5.972	1.7	1200
养老*	15.86	4.4	463
帮助子女*	23.36	6.5	212

注：带*号项目的支出统计按实际个案计算。

买大件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长将最快。①

总之，从居民的财产与消费的现状看来，这些年社会消费基金的迅速增长确实使居民的财产和消费水准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虚假繁荣和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市民实际的平均消费结构变动仍不大，突出表现在吃的费用仍占总收入的相当比例，而且居民手持现金过多，消费正成为一种财产标志，未能及时地充分吸收入经济系统中去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要使消费基金的增长实际收到理想的社会效益，关键点首先是应该使它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从而减少它的虚假性和不合理性。自80年代以来，上海市全民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一直徘徊在5%上下，跟同期内职工收入的增长极不相称。吃的比重居上不下也是和养殖成本高（如化肥、农药、饲料等支农工业品的价格提高）、机械化程度低、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造成农副产品价格节节上升有关。此外，在消费基金增长的同时，要改变目前以消费为财产标志的现象，即市场如何引导消费，吸收更多的游资用于再生产的投入，使市民真正具有参与经济活动的财产。比如象积极开拓金融股票市场、房屋市场等等，改变居民手持现金只关心添置生活大件用品的消费倾向，这都是值得重视的做法。这样做将使市民的财产与消费结构有机合理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人。

居住环境——居民们越来越关心的是什么？

市民的居住环境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类物质资源条件。下面我们主要从3方面来分析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即居民的住房条件，居住处的公共设施条件和外环境的生态条件等3类居住资源。

（一）上海市民对住房质量的追求越来越迫切。

住房条件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在住房数量方面，接受调查的市民家庭平均每户居

① 见《上海统计资料》1987年，第100期。

住面积为 24.78m^2 (含辅助面积, $S.D = 13.29$), 住房间数平均为1.71间 ($S.D = .852$), 居民在数量方面的要求是, 对房间数的要求已和对面积数的需求一样地迫切。

除了在居住的数量上尚未令人满意外, 更重要的是房屋结构和住房质量的问题已日益为居民所关心。上海市民六成以上住在旧式里弄和棚户简屋里, 设施简陋, 数户共居。全市一半以上的居民还在使用马桶, 将近40%的居民还在烧煤炉。1/4的居民家中无厨房, 只是利用走道、楼梯口做厨房, 而且房屋设备公用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都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居民目前对居住的要求已不再停留在追求面积或间数, 越来越多的市民关心住房的设备和独用的条件, 对居住质量的追求已成为居民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新动向。

(二) 从居住地的公用设施来看, 上海市民的满意度尚算不错, 问题之多是在服务的质量令人不满。

我们列出各类居住的外环境条件, 如交通、电话、水、电、教育文化设施等项目, 要求被调查者填答总的感觉如何, 结果发现, 市民对外环境设施的满意度大大高于对住房的满意度。

总的看来, 市民对居住区的市政和服务设施各项的满意感均在3以上(即一般偏较满意), 但得分的均方差皆接近于1或大于1, 说明对各项市政与服务设施的满意感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尤其是交通与文化服务设施的方便满意度差异更大些。这些差异主要是和地区有关。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另一种事实, 即市政各项公用设施及其服务不仅表现在设施数和服务量的完备上, 更应体现在服务质量的完美上。而群众对市政服务的满意度的评价可能仅体现为对数量上的硬指标满意度尚可, 比如象住地附近有没有这种服务, 有便会觉得满意, 没有便觉得不满意, 而对服务的质量满意度仍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电话为例, 问卷得分中以对电话条件的总感觉得分为最高, 被调查者显然是以从他的住处到公用电话站的距离远近来理解其方便程度。据统计这一距离, 全市平均仅3分钟左右即可抵达, 因此在回答时就觉得很方便, 但一旦涉及到使用电话时, 则电话通讯上所存在的线路不畅等服务质量问题是人人感觉到的事实, 也是地区居民觉得无能为力的普遍现象。在交通问题上同样也存在这种问题。市民从住处到最近公交车站的平均步行时间在5分钟上下, 基本上达到一般城市建设标准, 但公交车的服务存在严重的问题, 乘车难仍是群众仅次于住房的公共社会问题, 因此, 增加设施服务的网点和提高服务质量齐头并进是今后城市生活设施发展中应当同时注意的两个方面。

(三) 环境的污染与保护的问题。

在居住区的外环境质量上, 市民对环境的污染与保护问题也已表现出相当的关心。被调查的1200名对象, 分散居住在全市12个市区的85个居民委员会, 我们了解了他们对自己居住地环境污染的5项指标的情况(噪音、烟尘、有害气体、污水、垃圾)。

结果表明, 市区居住环境中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是噪音和烟尘, 其中又以烟尘为更严重些, 影响面也广些。据了解, 目前上海市民疾病致死的第三大病因是呼吸道疾病, 而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原因是空气中的烟尘污染。有关专家研究后认为, 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使用煤炉引起小环境的空气污染直接有关。因此烟尘已成为影响市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一大公害, 而且它和住房条件之差有关。

在地区的公害问题上, 区域之间的差别比较大, 各项指标平均数的标准差均在1以上,

其中以有害气体和噪音这两项的地区差别尤为显著,而有害气体和噪音主要是由工业化引起的,因此群众对搬迁居民户周围产生有害气体和严重噪音的工厂呼声较大。

为了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市政府近几年来作了极大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调查发现,群众于居住区的绿化和公共卫生的状况仍表示相当大的不满意,尤其是对绿化的满意程度处于对居住地环境不满意程度的首位,平均得分为2.428分,比对住房满意度的2.541分还低。由于绿化工作对改变市区空气污染和降低噪音等主要公害现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当引起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重视。目前上海人均公共绿化面积不足一平方米,这几年虽然大规模开展了一些植树活动和开辟开放公园,但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业余生活——市民生活丰富多彩吗?

有关市民的业余生活有不同的分析角度。我们在这里使用较广义的业余生活含义即指市民从事社会有薪劳动外的一切活动,通俗地讲即是职工上下班以外的生活活动,包括睡眠、吃饭等满足生理需要的活动和家务劳动等。

(一)全市成年居民平均每周用于有薪工作的时间耗费为社会时间总量的1/4,其余皆为广义的业余时间。

我们通过对被调查者所作的一周生活时间安排记录,得出按男女性别区分的成年居民一周生活时间分配表。(见表6)

该表显示的时间分配状况是18岁以上成年居民的生活活动平均状况,它包括了在职和不在职的市民,因此在工作时间的平均占用上会低于实际在职职工的工作消耗时间。但这样却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各项活动和社会总时间之间的比例关系。表中显示上海市民有薪工作活动包括路途交通时间内占社会时间总量的1/4左右。对于一位具体的在职职工来讲,他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是他生活总时间的30%以上,但在全市成年人中平均起来这个百分比就明显降低,这也正说明了上海拥有为数不少的非直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有闲”人口。

除去了有薪的工作时间之外,社会上拥有时间总量的3/4为广义的业余时间。下面我们通过业余时间中的3个主要部分,即满足生理需要的活动、家务劳动和自由支配的时间活动来观察市民生活的情况。

(二)上海市民用于吃饭、睡觉等满足生活需要的时间耗费较大。

从表6中可以看出上海市民用于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耗费平均为每周70小时以上,即差不多每天花费10个小时在睡眠、吃饭或个人卫生方面。这和其它国家相比差距是比较大的。根据苏联学者戈尔顿等提供的研究结果,苏联城市公民此类时间为65个小时,欧美各国一般也平均在60小时左右。上海市民的生理需要时间占社会时间总量的42.86%,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比例。睡觉和吃饭的时间长也许是上海市民的一种文化习惯的结果,这个特点短期内很难有所变化。

(三)市民平均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每人每天达3小时以上。家务劳动的承担者主要仍是女性和老人。

从表6中可见,市民平均每周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在21小时以上,即平均每天花费3小时以上。将这个时间和社会有薪工作时间的消耗相比,差不多是有薪社会劳动时间消耗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将社会劳动的时间总量定义为有薪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教育子女

表6

上海市民的时间分配表(每周每人平均小时数)

生活内容分数	总平均数(所占百分比)	男性	女性
T1. 有薪工作时间	42.40 (25.32%)	47.75	37.02
其中在职工工	52.36	53.83	50.89
T2. 满足生理需要时间	71.78 (42.86%)	70.89	72.67
T3. 家务劳动时间	21.28 (12.71%)	14.96	27.65
T4. 教育子女时间	1.36 (0.81%)	1.42	1.29
T5. 个人学习与创造活动	2.65 (1.58%)	3.42	1.88
T6. 家庭娱乐活动	18.62 (11.12%)	19.43	17.80
T7. 社会娱乐活动	3.82 (2.28%)	4.14	3.50
T8. 社会交往活动	3.20 (1.91%)	3.21	3.19
T9. 社会工作等活动	1.97 (1.18%)	1.87	2.07
每周总计	167.46 (99.77%)	167.09	167.07

注: 1. 共计个案1 200人, 其中男性居民602人, 女性居民598人。

2. 有薪工作时间包括上下班交通时间。

时间的话, 那么从广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家庭经济的时间支出(即后两者之和)比重差不多是社会劳动时间总量的1/3左右。

市民家务劳动时间支出的数额和男女性别以及年龄大小的关系最为密切。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支出只有女性的一半左右, 和性别的相关度达0.4173。年龄越大家务劳动承担的时间也越多(但非线性相关)。此外, 家务劳动的时间数和教育水平及个人收入也有些关系。一般是教育水平越低, 个人收入越小, 家务的承担量便大些, 说明在家务劳动和社会有薪劳动之间也有一定的分工关系和有机联系。同时还发现, 家务劳动时间支出的多少和对夫妇关系的满意度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3411), 可见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也是和睦夫妻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四) 市民平均每周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3—5小时(包括休息日), 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渡过。

表6中第T5—T9各栏的时间内容属于个体可自由支配的生活时间。这些活动都是市民业余生活中对个体人格的发展和自我表现最为实在的生活内容。这些生活是真正的闲暇生活, 平均每周计算为20—36小时左右, 约每天平均3—5小时不等。从总量上看, 上海市民的闲暇时间并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和发达国家市民的闲暇时间拥有量相差很大, 问题似乎是在于在闲暇时间使用的结构上有较大的差别。上海市民的闲暇时间绝大部分是在家中度过, 不少人是在看电视或无所事事中打发光阴。市民用于参加社会性娱乐休息活动、社交活动或社会工作等活动的时间比例极少, 其比例数之大殊为可观, 可见上海市民闲暇生活的社会性程度之低是不同于发达社会里的闲暇生活之主要特点。

市民每周每日平均的闲暇时间数跟年龄的关系最大, 其中18—25岁和60岁以上的人群组平均每日闲暇时间可在5.8小时以上, 而26—40岁的人群组此数为3.69小时, 41—60岁的人群组为4.10小时。可见最辛劳而缺少空闲的是初婚后的10—15年内(上海平均初婚年龄为26

岁)的市民。

从闲暇时间的总量上看,男女市民的闲暇时间相差并不是很大,但在分配利用方面,男性用于个人学习与创造活动和社会娱乐活动的时间多于女性,用于社会工作等活动方面少于女性。在用于社会交往活动方面,男女所花的时间则几乎相等。

(五)市民对丰富业余生活内容的要求多种多样,主要烦恼是技能、时间和经济三方面资源不足。

我们询问了受调查者平日所喜爱的业余生活内容是什么,回答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其中对各种娱乐活动的兴趣尤为集中,喜欢看电视和阅读书报杂志的居于首位(均占80%以上),其次是喜欢看电影和外出旅游(均占60%以上),喜欢观看戏剧、音乐等文艺表演和从事健身锻炼的人数也在40—50%之间,喜欢游园、从事公益活动、自修各类知识的人数也有35—40%。此外,种植花卉、摄影、上图书馆,进行游艺活动、集邮和养鸟等活动也均有一定比例的爱好的。这些活动虽然有一部分能在家庭内部和居住处进行,但相当部分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的。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影响他们开展上述这些业余活动的主要原因除了是缺乏时间(占58%)和缺少经济能力(占40%)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是70%的人认为他们参与各种社会业余活动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比如水平差,没有设备,现有服务缺乏吸引力等等。这个原因也许确实比时间和经济的资源来得更为突出些。因为从闲暇时间的总量来看,上海市民的自由度并不能说很低,从经济能力来讲也确实有不少人能承担得起大众化的业余消费。但一方面市民业余消遣的技能素质偏低,另一方面社会上又缺乏相应的具有吸引力的服务,于是许多人的大多数闲暇时间便在家中呆坐于电视机前度过。近年来市内出现的麻将热或许便是时间、经济、技能三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兴趣面来看,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喜欢棋艺麻将者为16%(包括下棋、打纸牌等),和其他活动相比此比例并不是很大。但又麻将之所以能成风,正是由于有为数不少的人确实具有相当的空闲时间而不愿意光坐在电视机前,他们需要一定的社会性娱乐;又麻将,经济上的支出并不多,此外比坐咖啡音乐茶室或参加舞会来得实惠,而以赌博为目的又麻将本身便是打着业余生财的主意,以解经济能力之围;较切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和游戏心理,它随机性过强,技能要求反而便低些,青年人一学便会,老年人中精于此道的又不乏其人,因而业余生活里大战方城便会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由此看来,时间资源、经济资源和技能资源是丰富市民业余生活的三个相辅相成的资源条件。如果说时间资源和经济资源虽嫌不足但尚可应付或挖掘的话,那么70%市民在业余生活的技能素质上的问题是否更应当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生活满意度——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问题

群众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个体对自我生活作社会衡量的结果。当被调查者被问到他对生活某一方面是不是满意时,正常的回答一般都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自己在这方面生活情况的理解和认识。他首先要了解问题所指涉的方面个人情形如何,社会的一般情形又如何;同时也会联想起自己的过去如何,社会的过去又如何;甚至会考虑到自己所得和社会一般所有是否合拍;自己的要求是否能满足;社会于这方面的前景又如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综合考虑和认识之下,被调查者才会作出对这方面生活满意或不满意的各种程度的回答。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是个人所认为的自己与社会的整合度状况和团结感,是一个十分基本的认知

层次上的个体生活评价内容。

(一) 上海市民在生活各领域的感受中,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评价最高, 对住房和工作收入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在调查问卷中, 我们分散列出了涉及市民生活各方面的指标37个, 要求居民填答这些方面的满意度状况, 评价是以五级计分法计算的。调查结果分析出8个方面的生活内容。经过对这8类因素的因子承担数作数据处理后得出下面这张群众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表。(见表7)

表7 市民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表

生活方面	满意度得分	标准差	调查个案数
家庭生活	4.1332	.7829	1200
居住处的公共服务设施	3.7500	.8797	1200
人际关系(家庭外的)	3.6357	.7170	970
子女的教育	3.4490	.8577	1197
工作	3.2538	.7884	970
业余生活	3.1227	1.0384	1200
经济生活	2.9991	.9024	971
住房	2.6536	1.1133	1200

注: 满意度得分以五级评分表示, 5为最满意, 1为最不满意。

表中显示, 市民在生活的各主要领域里以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为最高, 其次是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家庭外人际关系的满意度。^① 对子女教育、工作和业余生活的满意度皆处于平平之中, 而感到不很满意的是经济与住房。这一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及次序很能说明生活满意程度不但和社会拥有的资源种类与数量有关, 而且是跟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各类资源的实际拥有状况有关的, 尤其是和获得这些资源的渠道与分配状况有关。一般地说, 社会资源的获得越方便, 对资源控制的自主性越高, 分配上越公平, 满意度就越高。家庭生活、公共服务设施和人际关系等, 这些都是个体所能自然拥有的一些生活资源, 而且在分配上比较均有, 便容易得到满意度的高分。与之相反, 就经济与住房来讲, 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资源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又有公平分配的问题, 因此群众的意见就较大。所以从满意度的评价上很能反映目前社会上个人生活质量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哪些。

(二) 市民对自己身心状况的满意度是一个较为重要而有效的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

由于生活满意度在评估生活质量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不少研究都力图从满意度方面来对生活作出一些总的评估。可是, 因为满意度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各方面的生活满意度又难以相互替代或简单地加总, 这就造成在综合评估生活质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 有些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计算模式来综合计算生活总的满意程度。这里, 我们从上海市民调查的资料中分析出两个较为简便的直接可用来综合评估生活满意状况的指标, 这就是市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心情状况满意程度的指标, 或称为市民的自我满意度指标。

^① 其中有关公共服务设施的指标包括了居民用电、用水、电话、交通等方面的满意度, 有关分析见本报告“居住环境——居民们越来越关心的是什么”这一节。

从理论上讲,个人的自我满意度是个人对生活的一个直接的自我总结。它是经过个体对生活各方面情况作自我权衡后得出的。身体状况和心情状况是自我认识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自我评估最为概括的内容。因此,个体对这两个方面的自我满意程度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个体所抱有社会认同感的一个可信指标,这是有道理的。

同时,实际资料分析也证明,个体自我评价的这两个指标与生活满意度8方面领域里的满意度均存在着一定的极有意义的相关性。这就说明采用这两个指标对综合反映各领域的生活满意度会有较好的指示作用,我们觉得使用自我满意度的评价确实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指标来衡量群众对生活的总满意度。

从市民自我评价满意度上看,市民中对生活表示相当满意的个体大约在13%左右,而很不满意的个体大约是1—3%,38—39%的市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处于一般状况之中,而持比较满意态度的市民大约是33%—41%,不大满意的约7—12%。简单地讲,大约半数左右的市民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好,但也有大约10%左右的市民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对于这部分人的满意度结构和需求意愿是我们应当密切予以注意的。

(三) 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群众对生活的满意度是个体对社会具有认同感的重要标志,从而也是直接造成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主要因素。从群众对生活满意度所显示出来的各种特点能为我们建立社会目标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提供一些重要的依据。

首先,我们认为,重视家庭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努力保持家庭生活的美满健康是保证社会安定团结的基本条件。从生活满意度的各项指标值来看,市民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为最高,市民的自我身心状况满意度评价也和家庭生活满意度评价的相关性为最高。这些都充分说明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对于个体产生社会认同感和团结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从而可以说,我国社会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须依托于家庭的稳定与和睦。

其次,努力填补生活质量的缺口,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水平是保证社会安定团结的关键。在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构成中,物质资源的匮乏与物质资源利用上的不平衡是产生生活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其中缺口在于对经济生活和住房状况的意见为最大。因此,这两个方面应是上海今后社会发展中须密切予以重视的两个瓶颈。对经济生活的意见,一方面是集中于对个人收入的意见,另一方面则反映于对物价的意见。前者的主要矛盾为分配公平的问题,后者则主要为承受力的问题(包括实际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对住房条件的意见,目前不仅仅是停留在对面积居住狭小的意见,而且对住房的质量、设施、环境构成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意见。这些都是引起市民对生活不满意的主要缺口。经济与居住的资源得到合理的解决,上海市民的整体生活质量水准肯定能得到全面的提高。

第三,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还必须十分注意个体对社会事实的思想适应能力,提高个体的社会参与感与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生活领域里任何一方面的不满意感,总有可能是双方原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的运行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个体对社会的要求和适应不够合拍。从上海市民生活质量的分析资料来看,市民对生活的评价越来越具有以个人为参照点来进行的倾向。因此,提高社会个体在思想和行为上的适应能力极为重要,不能使我们的市民都是只想到向社会索取,不躬身自问个人社会责任的“豪民”。我们主张要使用思想社会工作的概念来涵盖我们习惯上所使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法。因为从思想上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不光是一种政治性的工作,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不只是一种政治

目标,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工作和社会目标。对于一个开始重视以个人取向来评估社会的社会来讲,光从政治角度对个人的思想施加影响,往往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后果,甚至会诱发起更反感的情绪。思想社会工作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诸方面的社会内容,针对市民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各方面行为取向的心理文化因素,强调群众通过自我的社会认识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我的社会心理适应能力,从而调整自身的行为使之更适合于社会的需要,并获取更大的个人满足。正由于此类思想工作涉及极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因此光靠党政力量 and 一味强行正面灌输是难以奏效的。它需要更多地依靠各种社会力量和洞悉社会心理等科学技能的专门人才方能完成。

事实上,群众在生活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并不可怕,这是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众多研究表明,不满意感未必便和社会的基本群体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如年龄、性别、职业、地位等等),也并不必然地显示某种社会解体的迹象。重要的是除了努力从社会方面填补其缺口外,更应注意社会应当具备能引导个体做好“修身”工作的机能,增强其对社会事实的认同感。

精神健康状况——市民的生活幸福感

所谓精神健康又称心理卫生。从社会和人文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个人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疏导内心的情绪力量,能经得住适量的打击或压力,以及善于接纳自己。”^①因此,它所反映的是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精神健康者的适应能力胜过环境对他的压力,从而使他对生活拥有快乐感和幸福感,同时也便享有了较高的生活质量。从理论上讲,市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和幸福感是个体从感受上所萌生的一种社会评价,在实际研究中一般是使用各种精神忧郁症的量表来衡量。

(一) 精神忧郁症的量表显示上海市民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如天津市民。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使用了国际上通用的精神忧郁症量表来测量市民精神状况。这套量表包括对受测者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经验的各种感觉指标16个。分别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有无此种感觉,并根据感觉程度计量被测试者的心理是否存在压抑感与忧郁的症状。得分越高者,这种忧郁症症状越强,精神健康状况则越差,从理论上讲幸福感也便越差。

测试结果,上海市民的忧郁症量表平均总分为6.69分,对照国内同类研究,天津市民的总分为5.12分(见表7),^②说明上海市民精神上感到压抑的程度比天津市民较为强些,从而在生活的幸福感上或许就比天津市民差些。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上海市民在对人际关系的经验感觉上比天津市民显得更为忧郁些,上海人比天津人更多地会感到“别人对自己不友好”,“别人不喜欢我”,甚至于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场失败”(这三项经验感指标的总分,天津为0.44分,上海为0.59分)。资料还表明,上海市民对心理健康方面的感觉比天津市民来得敏感些,更易于从心理健康感中来表达自己所受到的精神压力。

(二) 从市民对生活的正向感受看,上海市民在竞争意识和对前景的希望感等方面均有可虑之处。

^① 廖荣利:《心理卫生》,台湾国立编译馆印部编大学用书,1986年。

^② 关于天津市民精神状况的资料,均引自林南写的《中国市民的忧郁症计量》,该文发表于1987年在天津召开的“精神卫生与压力”的国际讨论会。

表8

上海与天津市民精神忧郁症量表比较

精神感觉事项	天津	上海	精神感觉事项	天津	上海
1. 原来不烦恼的事, 开始使我烦恼	.46	.73	9. 睡不好觉	.66	.78
2. 不想吃东西, 胃口不好	.67	.54	10. 好象说话比以前少了	.48	.48
3. 觉得心烦, 亲友的帮助也不管用	.28	.36	11. 感到孤独	.19	.24
4. 不能集中精力要做的事	.60	.77	12. 感到人们对我不好	.10	.14
5. 自己感到泄气	.29	.43	13. 隔一段时间就会哭一场	.09	.11
6. 觉得做什么事都很吃力	.49	.94	14. 感到悲伤	.15	.17
7. 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场失败	.24	.33	15. 觉得别人不喜欢我	.10	.12
8. 感到害怕	.08	.14	16. 做任何事都不起劲	.24	.41
			总分	5.12	6.69

注:表中所示的分值平均最高值为3分,天津调查个案1000人,上海调查个案1200人。

精神忧郁症量表可以说是从反面来衡量市民的精神状态。我们另外还从正面来衡量市民的精神状态。表8便列出了4项对生活正向感受指标的频率表。表中的数字分别是应答不同感受情况的个案数及其占总调查人数的百分比,并计算出平均数值。从平均数看,市民的这4类感觉均处于“有时有”或“偶尔有”之间,跟忧郁症量表的平均数大多居于“没有”和“偶尔有”之间有所不同。而且大多数市民都表示他们经常会有或有时会有幸福的感觉,会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均占2/3以上)。

但值得考虑的是,在第一个指标“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强”里,应答从来没有这种想法的人占了517名(总数的43%),加上仅偶然有此想法的79人(7%),即总共差不多占半数的人平日很少具备这种生活上的自信心。我们认为这种自信心反映的是一种生活中的竞争意识,一个人只有时常想到自己应当和别人一样强,他们才会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上海市民中约有半数人缺乏这种生活上的竞争意识。接着我们还可从上表中发现,大约1/3的市民对前途并不抱有希望,这是和第一个竞争意识的指标有关联的。因为只有具备竞争意识,觉得自己在个人能力和其它社会条件方面跟别人一样强的人,他们才自然会对生活抱有希望。如此看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们虽然觉得自己很幸福,觉得人生也很有意义,但这种感觉是虚无缥缈的。因为这种幸福感和有意义感并不是建立在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强、觉得自己的前途是有希望的感觉基础上的,也许倒是更多地建立在“知足常乐”、“能混混日子”或“感恩戴德”的思想基础上的。应当说这不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正常的社会心态,不是一种健康的精神状态。

(三) 哪些人精神状态会健康些,会感到幸福些。

要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回答市民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跟哪些因素有关。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可得出如下几条线索。

第一,市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和生活幸福感跟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有关。大凡个体对生活持较为满意的态度,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好,则他们的精神状态便较为正常,对生活也容易产生幸福感。从本市的资料来看,对工作的满意感和对经济的满意感能使个体在人际经验和心理健康的感觉上处于较为幸福的水准上;对家庭生活的满意感和对居住条件的满意感能使个体在生理健康上持较为幸福的评价。

第二,市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和生活幸福感跟年龄和性别有一定的关系。资料表明,随着

表9

市民对生活的正向感受

人 数 (百分比)	感 受 度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项	经常有 (1)	有时有 (2)	偶尔有 (3)	没有 (4)		
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强	342 (28)	262 (22)	79 (7)	517 (43)	2.64	1.29
对前途抱有希望	403 (34)	278 (23)	109 (9)	409 (34)	2.44	1.27
感到幸福	405 (34)	373 (31)	113 (9)	308 (26)	2.27	1.18
觉得人生有意义	462 (38)	337 (28)	112 (9)	299 (24)	2.19	1.19

注：调查总人数1200人。

个体年龄的增大，个体无论是在生理、心理或人际关系经验感方面都容易出现不幸福感的倾向。上海市民中的老年人口比青年人口产生着更多的不幸福感。女性比男性较容易在生理健康方面产生不幸福感。在一些正向感受指标方面（如“对前途抱有希望”、“觉得生活有意义”），性别均为有意义的相关变素。

第三，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往往是造成精神健康状况欠佳和幸福感不足的直接原因。生活中偶发性较强的各类不幸事件，象失学、失业、失恋、失窃，婆媳、邻里、人事关系紧张，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重病或去世，工作学习的负担过重等等，这些打击或压力极易使个体的适应能力不堪承受而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和幸福感下降。数据表明，生活不幸事件和精神忧郁症指标的相关系数均在0.22—0.27之间（天津市的相关系数为0.22—0.30之间）。生活事件一般是被认为难以控制的变量，但从宏观上看，它是和个体生活环境中的这些压力是否已构成社会问题有关的。在一个社会问题丛生的社会里，成员的普遍幸福感是难以形成的。

反馈性行为——成员的社会积极性如何

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反馈性行为，指的是社会成员愿意为社会做些什么？这是从行为层面上对个体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个体在行为反馈方面表现得越积极，说明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价越高，越是竭力想从行为上来维护这种使他感到满意和幸福的社会环境。

这里，我们集中报告市民在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公益性活动两个方面的反馈性行为特征。

（一）全市约有5—7%的市民平日参与工作单位或里弄的社会工作活动。

从被调查者的时间记录资料中表明，市民中男性的7%，女性的6%，每周有一定的时间用于参加工作单位里的社会工作；男性的5%，女性的6%，每周有一定的时间用于参加里弄社区里的社会工作。

参加各类社会工作的人数参与比例和年龄有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参加工作单位组织的社会工作，以老年职工和青年职工的参与比为较大。据了解，这些社会工作的内容大多是共青团、工会、退休职工联谊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青、老年职工或具有广泛的兴趣、精力和空

闲的时间，比较乐于投入这方面的工作。至于里弄社区的社会工作，大多是由业已退休的老年人承担，这也可以从表中所显示的比例数中看出来。26岁以上的中、青年人在参与单位里社会工作的绝对人数上并不见少，但按年龄人口的比例来看则很低，而且他们从事的一些社会工作，有些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如脱产或半脱产的党、政、工、团干部等），作为对社会反馈性作用的意义就差些。而在里弄社区的社会工作方面，中青年居民的参与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上看都很小。其原因固然和中青年人的社会经济角色有关，他们绝大多数均为在职职工，不可能有较多的精力与时间关注社区的活动。但由于他们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故而这种冷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对提高居住区生活质量，缺乏参与感和积极性。

（二）在公益行为方面，市民的社会期望型公益举动和个人自觉型公益举动存在有较大的差别。

如果说社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某种经济方面的反馈目的（比如专职从事单位社会工作，从事里弄工作可领取一定的津贴报酬等）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公益性活动，便可认为是纯具社会意义的反馈性行为。公益性活动涉及的面很广，我们选择了一些常见的行为指标来作衡量，比如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经常义务打扫居住处的公共环境卫生，在公共车辆上是否向怀抱婴儿者或老人让座，在马路上遇到盲人、老人、不识路者是否愿意相助，以及热心参与救灾捐款，见坏人坏事报告民警或帮助维持治安等等。

研究显示，上海市民公益性活动的反馈举动较为明显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具有较为明确的社会期望性质的反馈行为，它包括如公共车辆上让座，为不识路的行人指路，参加单位或地区组织的救灾捐款，看到坏人坏事举报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都是来自行为者的外部的明确的社会要求，期望个体对此作出合理的反馈。另一种情况是个体自觉引发出来的反馈行为，它包括象义务打扫公共卫生，将街上的脏乱物拾起来扔进垃圾箱，搀扶老年人过马路，为盲人引路等等。这些情况发生时，对方一般不会有明确的表示，行动者本人也没有必尽的义务，因此和前者相比，自觉发生的公益行为比期望导致的公益行为其反馈性的社会意义更为大些。

对于这两类行为，上海市民的反馈经常性程度，是对期望型的行为反馈明显大于自觉型的行为反馈。我们将有关指标，按行为发生的经常性程度列为4级（0——从来不做，1——很少做，2——有时做，3——每次遇到都做），计算总分后得出市民对期望型行为的反应得分是1.6030分，对自觉型行为反应的得分是0.5493。两者相差一个等级还强。而且总的看来，市民的公益性社会反馈行为并不是很积极。

（三）道德领域正在成为渲泄生活质量问题的主渠道，公德行为的“世风日下”是社会反馈性行为不足的集中表现。

这些年来，人们在议论社会生活时，常常会对道德领域中的种种现象颇多微言，然而却又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大家对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自己的行为又很少以德行的标准去衡量。这种现象可以从生活质量方面来进行解释，也就是可以认为道德领域是生活质量缺口的一个渲泄渠道。道德领域中的问题正是生活质量问题上的自然流露。

在我国，道德与生活质量的这种关系更有其特殊性。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的民主与法制还不完备，社会对人治与道德的依赖过重；另一方面，十年“文化革命”动乱中，维系道德的真善美原则实际上已遭到破坏，整代整代人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愚弄和扭曲，道德之链已

成为一个十分脆弱的环节。因此，当社会的生活质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当社会资源匮乏或分配使用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时，如果在一个民主与法制完备的社会里，极可能引起政府的改组或法律的修改，甚至引起政治动乱和法律危机，而在我国就极可能首先在道德这一薄弱环节里冲开决口。道德领域之所以成为一种渲泄不满的主要渠道，其原因正是因为其它渠道难以畅通。

因此，我们在看到市民生活中子女因结婚向父母索要，邻居之间为公用住房的寸盘之地而交恶，公交车辆上无谓的争吵，路边行人为小事而恶语拳脚相向时，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道德上的沦丧或作“世风日下”的无谓之叹。我们应当认识到道德举动，尤其是公德行为是个体的社会反馈性行为的一种表现。这方面的不足，正是说明群众对生活好坏方面的意见需要有各种渲泄的渠道，他们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行为上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因此，保持或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着眼处并不在于道德说教，而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水准，在于提供政治与法律方面的种种条件，让群众有更多的渠道参与对社会生活的反馈，表现对生活方面的种种意见与态度。

1988年12月初稿，1989年3月定稿。

参考书目：

1. N.别斯图热夫-拉达等，《关于生活质量》，刊于苏联《美国研究》1978年第1期，转引自《社会发展科技预测译文集》，科学出版社。
2. 《社会发展指标选择抉择》，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工程研究室主编，1984年。
3. 《社会、经济、科技指标体系》，上海科学学所编，1982年。
4. 林南、王玲、潘允康、袁国华，《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
5. 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模型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6. 《上海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局编，1988年。
7. 《上海统计资料》，上海统计局编，1987—1988年。
8. 《突破生活素质之瓶颈》，台湾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中心，1983年。
9. 刘兆佳、尹宝珊，《香港社会指标研究的初步报告》，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研究中心，1987年。
10. Robert, J. Rolliact. 《The Handbook of Social Indicators》Ganland STPM Press, 1980年。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